

学林出版社



张重天文集

家乡飞来吉祥鸟

第一卷





上海浦东图书馆藏书



A20636100058133B

2012.10.15

张重天文集

家乡飞来吉祥鸟

第一卷

郭仲选题

学林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张重天文集 第1卷：家乡飞来吉祥鸟 / 张重天著. - 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9

ISBN 7-80616-747-1

I. 张… II. 张… III. ①张重天 - 文集 ②纪实文学 - 作品集 - 中国 - 当代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39533 号

张重天文集第一卷——家乡飞来吉祥鸟



作 者	张重天
封面题字	郭仲逊
责任编辑	乐惟清
特约编辑	顾 衍
封面设计	周剑峰
出 版	学林出版社 (上海钦州南路81号3楼) 电话：64515005 传真：64515005
发 行	学林书店 上海发行所 学林图书发行部 (文庙路 120 号) 电话：63779027 传真：63768540
印 刷	上海师范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14.5
字 数	31 万
版 次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3000 册
书 号	ISBN7-80616-747-1/I·277
定 价	25.00 元 30.00 元(精装)



1	2
3	
4	

1.1956年春，第一次授衔后，作者参加浙江军区第一届英模代表大会时所摄。

2.作者1959年5月摄于北京天安门前。

3.1984年4月，作者与萧华将军(中)、萧华夫人王新兰(左一)、原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张景华(后排左一)、著名部队作家王愿坚(后排右)摄于北京西山萧华将军寓所前。

4.1984年冬，作者与杨成武将军(时任福州军区司令员)一起审阅长篇纪实文学《忆长征》清样时，摄于福州梅峰宾馆。



1	
2	
3	4



1.1998年9月重阳节，与来访的冯国勤同志合摄于上海。

2.1999年3月，作者与中共南市区委书记、“张重文集”编辑委员会主任沈善初同志商谈工作时合影。

3.1988年4月，作者参加南京军区作家代表团，访问江、浙、沪三地。照片为访问杭州电化厂时所摄。左一为杭州电化集团董事长、总经理黄招有，左二为南京军区原创作室主任、著名作家胡石言同志。



4.1988年5月，作者访问全国著名企业家“五一”劳动勋章获得者、杭州万向集团公司董事长、总经理鲁冠球同志时合影。



1
2
3



1.1978年初冬，作者与夫人潘同摄于福州军区政治部大院内。

2.1989年5月作者与家人合影于广东珠海市（与澳门近在咫尺的拱北城楼上）。

3.1995年春节，作者与孙女张芸在杭州寓所书房里。



1.1995年深秋，作者与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左二）、孙道临（左五）、京剧表演艺术家梅葆玖合影于上海。

2.1999年2月，上海市浦东新区北蔡镇党委书记丁彩琴（左一）、镇长朱建忠（右一）、镇人大主任凤秀涛（左二）合摄于作者家中。

3.1998年春天，作者重返母校上海浦东北蔡中心小学，与少先队员在一起。

4.1991年2月14日（阴历除夕夜），在杭州某师直属通讯营，与战士欢聚，共度春节（时任某师副政委）。



1	
2	
3	4



序 言

上海市副市长 馮國勤

重天同志是南京军区政治部的一位资深著名作家，1949年7月参加革命后，一直在部队工作。年轻时当过秘书，并在元帅、将军们身边长期工作，写过不少作品，其中好作品不乏在国内外广为传播。如我们熟知的总政治部主任萧华上将的组诗《长征组歌》，总参谋长杨得志上将的革命回忆录《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冲破乌江天险》等，他都做过不少文字工作。除此外，在任部队专业作家后，更勤奋写作，特别是“文化大革命”后，他几乎每年一部长篇。他是个多面手，除了长篇、短篇小说外，还写长篇传记文学、多幕话剧、多场歌剧以及电影文学剧本等等。可以说：他“戎马一生，著作等身”，为部队和我国的文学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因而，他获得了国务院授予的文学艺术专家特殊贡献津贴。

张重天同志的作品，大多我都读过。他善于用白描手法，文笔清新流畅，语言通俗，作品构思独特，思想性强，有革命激情。他为人谦和，平易近人。他十分注重个人修养，乐于为同志办实事。在严峻的“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株连，

处境艰难，但仍坚持原则。为此，萧华将军曾深情地赠予他一首诗，其中的两句是“人瘦骨头硬，脸小面子大”，意思是说他为人正直，有节气。深得同志的爱戴和信任。

四年前，我收到他赠我的歌颂上海浦东改革开放的纪实文学《世纪桥畔的梦》一书时，就知道当时的南市区区长、现任中共上海市南市区区委书记的沈善初同志和豫园商城当时的总经理程秉海同志，约请他写一部反映南市区老城厢和城隍庙、豫园商城的纪实文学。得知后，十分高兴。我认为：他写了浦东，再写浦西，是一个上海作家反映故乡应尽的责任。那年春天，他就到豫园商城积极采访，同年6月，他应邀到深圳、香港采写当年红军大渡河连所在的驻港部队，回到杭州，一下飞机便病倒。他得的是血液病，不几天，病势严重，我派人到杭州部队医院去探望他。以后，他转院到上海解放军八五医院高干病房后，我又多次去探望他。他诙谐地告诉我：“这场病来势凶猛，病危十八天，几乎与马克思擦肩而过。”我看到他异常乐观，对自己康复很有信心，十分高兴，便鼓励他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他病了整整两年，想不到在医院医生、护士和他夫人的悉心护理下，终于恢复了健康。康复后又忙碌起来。今年10月28日，到豫园采访，适逢重阳佳节，我到他下榻的上海良良大酒店看他。他精神很好，桌子上堆满了资料、书稿，说即将开始对豫园一书的创作。我要他量力而行，不要过度疲劳。我走后，他便开始动笔，想不到抱病创作二十天，完成了二十万字的书稿，使我既惊讶又感动！

豫园商城约有五百年的历史，若从“点春堂”明代潘氏私家花园算起，也已阅历四百四十年沧桑。这里有明代留下的“三穗堂”、“点春堂”，也有清代建设的湖心亭、九曲

桥，真是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园林秀丽、商贾如云，不失为一块中外闻名的旅游胜地。改革开放以来，豫园商城在上海市委、市政府以及南市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抓住机遇，从筹办上海市第一只商业股开始，进行社会集资，滚动式的建设，改造豫园商城。从一期工程到二期工程，从原先五点三公顷的豫园城隍庙老园区，在区委、区政府的直接领导关心下，将发展成为四十九公顷的东方第一流的上海豫园集团公司。他们在原先陈旧的老城隍庙里，抓住机遇，以发展的大胆构思和大手笔，进行宏伟规划、精心设计、精心建设，开创了高发展、高效益、高创汇，取得了丰硕成果。从几亿销售额到如今六十个亿，名列全国中心城市零售商业排行榜前茅。从这里可以看出，上海人民乃至全国人民都把热情的眼光投向豫园老城隍庙这块宝地，看好、信赖上海豫园集团公司。

重天同志发扬了连续作战的部队作风，在掌握大量史料和进行不断采访的基础上，开创最高速度。《九曲桥畅想曲》讴歌了豫园商城，而更可钦佩的是，他用自己的真情实感客观地记录了豫园的昨天和今天，展望了它的明天。看了，使我感到十分亲切真实。我翻阅了全书，文字生动形象，清新流畅，紧扣主题，发扬了他一如既往的风格；此书既运用了丰富的历史资料，又能发掘现代豫园商城中各种典型人物的心态，反映了他们的创业精神。应该说，这是一部好书！看完后，我对豫园商城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应该说这本书既是一部艺术作品，又是一部走进豫园商城老城隍庙必读的“小百科全书”。

上海正在建设现代化的国际大都市，市政府三年前就提出构筑、实施上海商业新三年的开发计划。当时规划中

提出的重点“抓好东西南北中”五大市级商业中心的建设，其中“南”就是指豫园商城。豫园这个“南中心”完成得很好，豫园集团公司的领导应该看到，肩头责任的重大，应该奋起直追，借改革开放的东风，为在新一轮建设中创造豫园更加光辉的形象，以便跃进全国先进旅游、商业的行列。

衷心预祝在即将来临的 21 世纪的新的岁月里，豫园商城全体员工发愤工作，取得更大、更辉煌的成果。

1998 年 12 月 23 日于上海

我三次穿上军装(自序)

中国人都知道，毛泽东使中国人民站起来，邓小平使中国人民富起来。邓小平是当代世界公认的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设计师。他的一生传奇似地三起三落，我由衷钦佩这位伟人。

与小平同志相比，他是一棵参天的大树，我是一棵小草。但是“命运”安排我1949年参加革命后，也经历了三起三落的甜酸苦辣的历程。如今，我成为一个光荣的共产党员、专业作家和高级军官，但我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普通人，是一棵踩不死的小草。出版社要我写一部自传体的传记文学，我想用《越过半个世纪》为题目，有人说它太平了。我想用《我是一棵踩不死的小草》，大家说题目虽好，但似乎有些消极，最终我想还是用《我三次穿上军装》，并作为“张重天文集”的自序。

(一)

我出生在上海浦东一个小镇上，十六岁那年因家贫辍

学，离家谋生，在十里洋场的上海开了眼界，在学徒生涯中得到了生活的磨练。一次，在大光明电影院初识市委第四书记、上海总工会主席刘长胜，他引导我走上革命之路，从此穿上列宁装，参加了革命，那年月，革命洪流滚滚向前，在刘长胜书记的批准下，总工会秘书长毛齐华为我办手续，保送去“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深造。朝鲜战争一声炮响，在“革大”奋起报名，穿上军装奔赴抗美援朝第一线。准备过江参战，一个电报急速返回金华“军大”学习，之后改为在十三步兵学校接受严格军训。文化大进军开始，奉命赴杭州七兵团司令部，为兵团参谋长赵俊、副参谋长俞炳辉将军当秘书，忙里偷闲，读完《中国通史》及《中国文学史》。之后，“三反”打老虎，追随张爱萍将军左右，当打虎队员。但极“左”路线“华而不实”造成了错假冤案，结束时，不得不向“老虎”“送凤冠”。调任政治部秘书处任书记员，二十一岁在西湖边巧遇彭大将军，一番话鼓励我奋发向上。之后，一江山战斗开始，走上一江山前线，写出《红旗插上胜利坡》。之后一年，又陆续在报纸发表诗歌、散文、通讯，共写出八十多篇，大有一发不可收之势。

兵团缩编，我被调去余姚五夫“十九速中”任语文教员、班主任。刻苦教学之余，坚持写作创作诗歌、小说，先后在《浙江日报》、《解放日报》上发表，还受组织选派去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函授部学习。调回浙江军区三十年征文组工作，为十多位将军撰写革命回忆录。同年，加入“华东作家协会”，初识省军区政委周贯五中将，《五官庄四十烈士》一文一炮打响。之后又写《艰苦奋斗冀鲁边》、《温坊战斗》。也许有缘，周政委竟成了我的“保护神”，并由他介绍认识了许多将帅。

“大跃进”战鼓擂响，为了深入生活，搞好创作，我毅然转业去龙泉山区浙南军事钢铁厂锻炼。在龙泉山沟的草舍里，我作为团长秘书，闭门总结经验教训，并在工作之余，奋发阅读《资治通鉴》、《中国文学史》，为文艺创作打下了基础。

暴风雨之夜，传来喜讯，浙南钢厂厂长田景坡团长通知我收拾行李，重返军区，另行分配工作。

(二)

依依惜别龙泉山患难与共的战友，重返浙江军区干部部报到，得知我重回部队到周贯五将军身边工作。具体任务是：为首长料理日常文档，并开始创作反映抗战时期的长篇《冀鲁春秋》。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与合作者去艰苦的冀鲁边——乐陵农村体验生活，那里水灾、虫灾，又遇海啸，生活极端艰苦，与抗日大娘“三同”啃窝窝头、吃萝卜干、捣蒜泥，但却获得了与抗日战争时期艰苦的冀鲁边相似的第一手材料。斯时，得到了抗战时周政委原秘书当时上海警备区政治部辛国治主任的相助，住在上海沧州饭店，时任上海作协党组书记的峻青作为艺术指导，周政委也亲临上海召开冀鲁边老干部座谈会。此书共三卷，百万字，“文革”后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写《冀鲁春秋》长篇时，抽空还为周政委撰写回忆录，去北京等地采访，有幸遇到当时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为他撰写了《十八勇士强渡大渡河》、《冲破乌江之险》等回忆录（1957年，被收入高中、初中语文课本）。到北京又遇“四届人大”开会，在饭店见到萧华上将，他为我讲述二十一岁国共合作时挂少将衔，率八路军东

进纵队，挺进冀鲁边。十分有缘，在以后的岁月里，他竟成了我的良师、严父。在首都机场为萧华上将送行，巧遇正带领将军出访东欧九国的彭德怀元帅，他鼓励我：谦虚谨慎，再接再厉，当人民军队自己的作家。自此，我坚定了当好军队作家的信心。1964年9月，当时的总政主任萧华上将从上海开完中央工作会议，回杭州休养，闲来有兴趣写点诗散散心，周贯五将军推荐了我，在杭州铁冶路别墅里，见到了将军。他十分器重我，从此，我开始在他身边工作。

1964年国庆之夜，当时省委书记江华同志邀请萧将军欢度国庆，我作为随员同行。夜归，将军赋诗一首《西湖国庆之夜》。在我的怂恿下，10月4日发表在《浙江日报》副刊上，自此他写诗一发而不可收。于是在万松林、西子湖畔，晨出暮归，一同构思，创作了不朽史诗《长征组歌》。在此期间，为《长征组歌》审稿，坐专机赴京，受到了周恩来总理和朱德、陈毅、叶剑英元帅的接见，听取了宝贵的修改意见。此时，萧华将军由我牵线，为刚摘掉右派帽子在上影厂当编辑的作家白桦解决了重新参军的问题。此时，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在北京演出了音乐史诗《长征组歌》。马玉涛、马国光、贾士俊、耿莲凤等人参加演出，强大的声乐力量，相得益彰，成为一部生命力最强的传世之作。不久，“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我去大陈岛防化连锻炼，当了一个月兵，归来时在一江山扫墓遇见了许世友司令员。

姚文元抛出《海瑞罢官》，在江青指使下，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罪恶之火。我返回机关参加“文化大革命”，怎知战火越燃越旺，浙江军区机关“后院起火”，也成了两派，甚至发生斗争，万幸没有酿成武斗。萧华上将时任总政主任、中央军委“文革”组长，我时刻关心报纸，那时天天发表老干部

被打倒的头条新闻。我乘赴京去“军报”改稿之便，有幸与将军相约在京西宾馆共餐，我祝贺他。他有政治敏感，对我说：“重天，我有预感，从天安门扶着毛主席从金水桥下来时，我似乎预感到我将下台。”我听到此话，惊愕万分。他却说：“风雨飘摇，君不见天天有人被拉下马！你要有思想准备。”不久，在天安门广场又遇红卫军批斗彭大将军，我悲愤万分。返部队后，因患血液病在南京军区总院住院，突然接到通知，要我速返杭州学习。临行去西康路周贯五将军寓所辞行。他告诉我：“萧华下台了，戴了‘五·一六’总后台帽子，他得罪了林彪。你写《冀鲁春秋》被作为替萧华立传的一大罪状。你要谨慎，可能要整你！但要实事求是，该说的说，不该说的一句也不说。革命者要有骨气。”回到杭州，果然暴风骤雨。浙江省、杭州市社会上两派内战，动刀动枪。军区大院也不平静。二十军接替了省军区，熊应堂当了省军区司令员，南萍当了政委。我回杭州不久，果然他们组织了十多人的学习组，把我“软禁”起来，重点要我交代与周贯五的关系，说周是萧华线上的人，我是周的亲信。并许愿我升官当处长，我婉言谢绝。熊应堂找我谈话，我是如此说。“文化大革命”越演越烈，熊应堂在大会上公开点名说：有人给萧华树碑立传，‘五·一六’帽子在群众手里，该戴什么就戴什么。并派他的秘书做我的“工作”，要我交待，被我严词拒绝。此时，“总政”也派人来调查，说萧华肯定被打倒，还说北京“斗萧”时，萧华亲口说我是“五·一六”，并填了表。我没填过任何表，绝不相信萧华将军会乱说，故也拒不写材料。我要求他们给我看材料，并拿出证据来，定罪、关押、杀头请便。

熊应堂从我身上挤不出油水，便要我带罪立功。宣传

处组织五人小组，要我带队去大陈岛组织部队文化工作，临行前，又突然变化，说组织上已决定我复员到地方。我被株连贬谪出部队，这我早有思想准备。

(三)

1970年3月，宣传处长找我谈话：先说我是人才，部队需要我，但考虑到我身体不好，决定要我复员回地方等等。我打断他的话说：“不用说了，我愿意走。我相信我到地方靠一双手会自力更生的，会有饭吃的。”说实话，我心想他的话只能是熊应堂两个月前谈话的翻版而已，他也是无可奈何的可怜虫。我复员到了当时杭州两派斗争激烈的杭州市汽车运输公司，好在我是“五·一六”嫌疑分子，两派都不会拉我用我。我感谢革委会主任张华亭、副主任李世龙对我的重用。我到那里便放在政工组“以工代干”当干事，看看文件，写写简报，再就是到下面车站调查研究。我在“杭运段”八年，有五年被省、市文化局借调在外，其间我创作了独幕话剧《山村小站》，而且把省市话剧团一些当时所谓出身不好的名角搜罗到‘杭运段’，组织了一个文艺宣传队。在这文艺界万马齐喑，八亿人民看八个样板戏、文化生活十分枯燥的日子里，看到有新鲜的小戏，不但工人、农民喜欢，机关干部也高兴。在整整八个月中，《山村小站》竟演出了一百多场，轰动了杭州市。1977年，谭启龙同志调来浙江任省委书记，他的夫人严永洁亲自抓全国文艺会演，选上了话剧《山村小站》、越剧小戏《半篮花生》。当时的文化部长于会咏亲临杭州指导，看了戏盛赞《山村小站》之余，建议将这个小戏中的主人翁女站长改成“走资派”。我以为它是个小